

第 12 卷第 3 期 2019 年 11 月

Vol. 12, No. 3, November, 2019

国际高等教育

国际问题

在线学习的发展如何?	79
最大化大学的公民使命.....	82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格局.....	85
阿拉伯世界的高等教育治理及突尼斯案例.....	88

国际趋势

高等教育被迫国际化: 一种新兴现象.....	90
国际化如何影响学术文化?	93
印尼高等教育国际化: 近期举措及其问题.....	95
印度迈向国际化的缓慢步伐.....	97

关注中国

中国高等教育批判性思维与意识形态.....	100
中国“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及其科研生产力.....	102
中国留学生: 事实、路径和挑战.....	104

关注东南亚

老挝与柬埔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106
越南的毕业生就业	108

国家和地区

巴拿马: 高等教育是关键所在.....	110
肯尼亚大学: 金融破产的边缘.....	113
探索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公平: 阿根廷和智利的反思.....	115
哈萨克斯坦学分制度的发展.....	117

在线学习的发展如何？

Richard Garrett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主任

电子邮箱: richard.garrett@i-graduate.org

本文旨在传达一个关于全球在线高等教育的演变、意义和未来的观点，针对的是试图了解这个充满活力且复杂领域的读者，也即高等教育领导者和从业者、政府和院校以及在线学习公司。本文借鉴了 2017 年和 2018 年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 (The Observatory on Borderless Higher Education, 简称 OBHE) 编写的一份报告和一系列国家案例研究。世界各地在线高等教育的范围、多样性和相对成熟度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在全球或跨境层面评估在线高等教育重要性相关研究的缺乏，推动了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案例系列研究。

该报告区分了五种国家类别。第一类是“远程非在线”组 (Distance Not Online)。此类别适用于远程学习部门较多且除某些慕课之外很少或根本不使用在线学习的国家 (如埃及、印度)。第二类是“在线学习边缘化”组 (Online Learning as Marginal)。这类国家的大学在校学生人数快速增加，有一些在线教学的元素；但是由于大多数远程学习与实地学习中心混合在一起，因此远程学习在国家层面被边缘化 (如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第三类是“模糊增长”组 (Blurred Growth)。这一组的特点是非正式、远程和在线学习招生的定义不明，在学生人数增长方面一直超过整体市场 (如墨西哥和西班牙)。第四类是“在线学习显著增长”组 (Clear Online Growth)——在线远程学习部

门在入学率方面继续优于整体市场 (如美国)。最后是“峰值/下降”组 (Peaked/Decline)，在线注册学生数的增长是以国家远程大学为代价的。近年来，在线注册学生数出现了达到顶峰、继而相对平缓或不均衡的发展趋势 (如英国和韩国)。

传统实体高等教育保持增长

判断在线高等教育的一种方法是根据自 2000 年以来的总体高等教育入学率和资助趋势。从一开始，倡导者认为在线学习定位为具有规避传统院校准入、质量和成本限制的潜力，这表明新技术可以完成标准基础设施所不能完成的东西。但自 2000 年以来的入学趋势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在过去二十年中，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本科生入学率翻了一番。

在这类扩招学生中，绝大部分的学生与在线学习没什么关系。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的案例研究发现学生总体入学率超过在线学生入学率 (在线学生入学率低于 10%)。在那些在线教育确实代表了入学规模的国家，传统年龄的本科生，也即高等教育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很少成为在线教育的目标群体。巴西可能是个例外，因为许多大规模的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使用在线学习来快速扩大招生规模。尽管人们担心传统实体高等教育的扩张潜力，但这种模式已经被证明适应性很强且受到学生、家长、院校和政府

欢迎。

代价如何？

关于在线学习性价比的争论仍在继续。许多教师和管理人员认为在线学习比传统学习更昂贵。在线学习的内容和方式比知识传授模式中的“事实”更重要。在线学习开展过程中牵涉到许多因素，因此很难获得简单的结论。正式评估需要定量数据，但教育的主观性和相关性需要定性数据。可衡量的东西并非一定是必需要衡量的。

最重要的是，在线高等教育尚未明确显示较低的开发和授课成本。换句话说，拥有合理成本削减模型和质量保障的特定形式的在线高等教育很少得以扩张。少有非营利性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在线学习且以节约成本为首要考量。毫无疑问，可获利的、受人欢迎的和高质量的在线课程是存在的，它们获得了大量成果。要点在于，在线课程倾向于强调便捷而非成本，因此，价格往往是质量的代表。

跨境在线学习情况如何？

早期对在线学习充满热情的另一个原因在于科技可能会瓦解国家高等教育系统，从而推动大规模虚拟的学生跨国流动。事实证明，现实情况不太一样。传统高等教育的基数大，因此传统的国际学生流动自 2000 年以来增加了约三倍，达到近 500 万人次；而跨境在线学习相比之下仍处于边缘地位。

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报告分析了来自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数据。数据显示，完全接受在线或远程教育的国际学生数量占总国际学生入学人数（含所有的学习模式）的比例适中且通常呈现下降趋势。尽管在线学习提供了便利且直接或间接降低了教育成

本，但偏好、习惯、监管和技术限制等因素参杂在一起，使得这种形式成为招收国际学生的“边缘”途径。

结语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测，在人口增长、新兴经济体中新兴中产阶级的增加以及中学教育成果不断上升的推动下，全球对高等教育有需求的人口数量将从目前的 2 亿人增加到 2030 年的 4.14 亿人。2000 年至 2015 年间，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增加了一倍多，尽管人们预计远程学习需要解决迫在眉睫的能力差距问题，但增长主要体现在实体教学模式中。但是，只有在在线学习发挥更大战略作用的情况下，额外增加 2 亿学生才是可行的。

固定宽带因特网连接正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达到最大限度，这是在线学习起飞的重要前提。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在线学习视为一种优缺点并存的工具，而不是受到盲目支持或是被刻板看待的东西。但很难想象完全符合大部分传统年龄本科生（这是高等教育市场的主体）的在线学位。就其本身而言，在教学上，授课方式太过局限，无法让典型的学生参与整个冗长的学位课程。在线学习不适合旅行、沉浸和建立网络，尤其是对于国际学生而言。对于较短期的课程（至少在研究生阶段）、对于年长的学生与那些以网络便捷性为主报名学习的学生来说，如果教学方式得当，完全的在线学习模式可能是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许多院校和学生来说，融合在线和面对面学习可能是最好的发展方式。混合式学习意味着在线学习可以补充而不是与传统校园竞争；支持学习者、教职员工（至少在城市地区）；并提供个人与小组、在线和面对面学习的创造性组合。在线高等教育的愿景

使线上和校园发展保持一致，这肯定符合大多数院校的长期利益。

注：无国界高等教育观察组织成员院校和组织可以获得本研究完整的报告和国家案例研究，敬请访问：www.obhe.org。

最大化大学的公民使命

Ellen Hazelkorn

爱尔兰都柏林理工学院 (Dubl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 (Higher Education Policy Research Unit) 荣誉教授、主任, BH Associates 合伙人、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 ellen.hazelkorn@dit.ie

在米歇尔·奥巴马的自传《成为》(Becoming)中,她谈到自己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南部长大,谈到芝加哥大学及其周围社区之间的鸿沟。她写道,“对于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来说,精英意味着不适合我们。它(芝加哥大学)的灰色石头建筑几乎完全背对着校园周围的街道……就像许多南方人一样,我的家人保持着对大学的一种悲观和有限的看法,即使我的妈妈曾在那里快乐地工作了一年”(2018, p.147)。

米歇尔的反思在最近的英国调查中得到了回应。根据公民大学委员会(the Civic University Commission)2018年的一项调查,5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大学感到“自豪”。然而,35%的人无法说出当地大学参与社区服务所做的任何一件事,30%的弱势群体受访者从未到访过当地校园。

这重要吗?

大学在服务社会上做得很好,在国家/民族形成、科学发现、知识和公共话语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但如今,在国家内部社会经济和地区差异扩大以及全球竞争性经济环境的背景下,人们越来越关注学生的表现、学习成果和就业机会。教育和科研的贡献及其对国家和地方目标的价值和影响也受到质疑。还有人担心追求全球声誉和地位是以牺牲社会责任为代价的——这种担忧反映在人们对公立院校和精英的信任崩溃之中。

因此,人们希望大学更加负责并为其城

市和地区带来更多公共利益,这种公共和政治要求在许多国家正在不断增加。大学被要求超越其教学、科研和知识的传统,并超越自己的界限——无论是真实还是隐喻的,以期以新颖、具有挑战性和有影响力的方式与其社区和所处地区建立联系。

这些紧张局势引发了三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公众对公共服务(包括教育)的态度;社会不同部门之间的公众信任程度;公众对有效利用公共资源、对社会的贡献和价值的关注。

参与式议程

“参与”一词现构成了政府的一个关键部分,相应地,也是高等教育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看,在教学、科研或知识活动之外的学术参与被称为“服务”。多年来,“服务”主要被解释为参与大学委员会和/或专业组织。今天,大学与社会和经济之间的接触是一个重大问题。它是国家政策制定的关键组成部分,是院校概况分析的工具和/或一种绩效指标——作为更广泛的问责制和系统指导议程的一部分。

经合组织发起了一个有影响力的项目,旨在探讨高等教育与40个地区和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开展参与活动的驱动因素和障碍。这些问题在《高等教育和地区:全球竞争与本土参与》(Higher Education and Regions: Globally Competitive, Locally Engaged)一书中得到了总结。欧盟为区域主

管部门制定了题为《连接大学与区域增长》（*Connecting Universities to Regional Growth*）的指南，且目前正在推行一项基于地方的区域发展战略，名为智能专业化，其中大学科研和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是关键参与要素。在《世界高等教育：平衡全球与地方》（*Higher Education in the World: Balancing the Global with the Local*）这一报告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大学创新网络（Global Universities Network for Innovation）提出了公民大学的理念以及回应重大挑战的需求——正如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中涉及的问题一样。

欧盟还一直在开发用于院校概况分析和排名的工具，以获取知识交流、区域参与以及毕业生就业的类别。这始于 U-MAP（2005），即一种院校分析工具，然后应用于多维全球大学排名（U-Multirank，2014）。《E3M：大学第三使命的欧洲指标和排名方法》（*E3M: European Indicators and Ranking Methodology for University Third Mission*）（2012）是另一个欧盟项目。这些举措类似于“卡内基沟通参与选择性分类”（the Carnegie Elective Classification for Communication Engagement）（2006年）。其他工具则包括“校园契约参与指标”（Campus Compact Indicators of Engagement）（2001），“塔卢瓦尔网络”（Talloires Network）/英联邦大学高等教育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onwealth Universities）“公民参与清单工具”（Inventory Tool for Higher Education Civic Engagement）（2004），澳大利亚大学社区参与联盟（the Australian Universities Community Engagement Alliance, AUCEA）（2008）和英国公众参与国家协调中心（UK National Coordinating Centre for Public

Engagement）的各类倡议。全球/商业排名也开始关注参与度指标。

威尔士的发展

鉴于高等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许多国家的教育部正在寻求如何引导大学更大程度地参与公民活动。它们所采用的政策工具包括国家框架和设定优先事项，业绩指标和/或其他供资工具，创业教育和基于工作的学习，以及与国家优先事项相一致的评估标准。

例如，“荷兰高等教育和研究战略议程”（the Netherlands Strategic Agenda for 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将知识增值视为一项关键优先事项，即从知识和社会利益中创造经济和社会价值。该议程的时间跨度为2015至2025年。芬兰的绩效资助模型包括与实现国家和战略目标以及鼓励合作相关的指标。爱尔兰“2016~2019年教育行动计划”（Action Plan for Education 2016~2019）要求各院校展示它们如何促进“个人发展以及可持续经济发展、创新、对社会挑战的识别和应对、社会凝聚力、公民参与和充满活力的文化活动”。

威尔士也不例外。传统上，威尔士高等教育的特点是对威尔士人民的承诺，为当地人民提供公共捐赠和终身学习机会。然而，今天威尔士是学生的净进口国和毕业生的净出口国。在英国脱欧的背景下，预测表明，威尔士在经济上可能差于英国其他地区，在教育成就上的差距更大。因此，威尔士政府引入了一些创新性的政策举措以引导国家发展。尽管英国采用市场化的高等教育方式，学费不断上升，院校和区域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但“公共利益”的概念是威尔士公共政策的基础。2015年，《未来世代福祉法案》（the Well-being of Future Generations Act）规定，每个公共实体都必须努力实现七项福祉

目标，以确保威尔士的繁荣和适应性，以更加健康、平等的方式发展，且由具有凝聚力和具有使用威尔士语的社区组成，由此构成一个肩负全球责任的社会。新的威尔士高等教育和科研委员会（Tertia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Commission for Wales）将在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方面建立更好的协调，并监督院校与威尔士社会之间开展更多的公民参与活动。

在此背景下，由 John Goddard、Ellen Hazelkorn、Stevie Upton 和 Tom Boland 撰写的《最大化大学公民贡献》（*Maximising Universities' Civic Contribution*）（2018）一书提出了六项建议：

- 为威尔士的后义务教育阶段制定战略愿景；
- 将公民参与作为大学绩效的正式方面；

- 发展区域性院校群，作为加强高等教育与威尔士社会与经济其他部门之间的地方性计划和决策的一种手段；

- 激励大学与后义务教育领域的其他部门之间的合作；

- 纳入和增加包括成人教育在内的终身学习机会，以作为公民使命的内在特征和责任；

- 根据与威尔士国家和地区优先事项的合作和协调内容，为大学提供参与资金。

其目的是确保一种连贯的综合方法，避免导致教学和学习、科研和创新、参与和公民使命成为三种截然不同的平行活动或相互竞争资金、时间和地位。其目标是鼓励采用嵌入式方法，把公民使命作为大学核心作用和责任的一部分，既培养在威尔士大学学习的公民，也培养服务于威尔士发展的公民。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格局

Daniel C. Levy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尔巴尼分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Albany) 教育政策与领导系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olicy and Leadership) 杰出教授

电子邮箱: dlevy@albany.edu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规模庞大且不断扩张, 了解其国家配置与相关情况非常重要。现在可以通过分析有关私立高等教育的全球数据库来实现这一目标 (<https://prophe.org/en/global-data/global-data-files/global-enrollment-by-country/>)。这是第一个全面分析私立高等教育的全球数据库, 涵盖了拥有高等教育入学率数据的所有 192 个国家, 其中有 179 个国家允许我们查看或统计私立与公立教育部分的数据。本文使用 2010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 (纵向比较相对有限)。

本文阐明的是: 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格局与现实具有双重性。一个现实是私立高等教育分散于所有地区的许多国家中。然而, 另一现实是私立高等教育在最大的国家系统中不成比例地聚集。显而易见, 这两个现实互证了各自的特殊性。但是, 只有通过同步确定私立高等教育的分散和集中模式, 我们才可以了解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总的国家配置。

私立高等教育广泛分散

大规模扩张并不是私立高等教育在各国广泛分散的必要条件, 但扩张确实有利于私立高等教育的广泛分散。直到几十年前, 许多国家没有或只有相当小规模私立高等教育。在近几年中, 尽管公共部门本身在毛

入学率方面的增长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 但私立高等教育在总入学率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尽管私立高等教育入学比例增长现在终于放缓, 但其绝对增长仍然强劲。在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 虽然全球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比从 28% 增加到 33%, 但入学人数从约 2 700 万增加到了近 5 700 万。保守估计, 现在私立高等教育中至少有 7 500 万学生。

国家分散的一个明显例证是公立垄断体系几乎消失 (正如《国际高等教育》第 94 卷中的文章《消失的公共垄断》所述)。在我们调查的 179 个国家中, 可能只有 10 个国家仍然缺乏私立高等教育, 其中一些国家要么正在努力解决私立高等教育提案, 要么有一些模糊的私立高等教育形式 (如国际办学而非国家办学模式)。我们现在可以补充一点, 世界上 98% 的入学人数都来自双部门教育系统 (即同时拥有公立和私立教育部门)。

然而, 私立高等教育无处不在并不是国家分散的唯一例证。直到上个世纪中叶, 美国私立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仍让世界其他国家无法企及。虽然美国私立高等教育仍然在质量、声望、科研和财务上屹立不倒, 但是如今它在全球私立院校招生中所占比例仅为十分之一。印度是新出现的“巨人”, 有超过 1 200 万接受私立高等教育的学生, 这是其他国家招生人数的两倍以上。如果排除印度数

据,那么全球范围内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从 33% 下降至 29%。如今,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分散程度已如此,再也不会呈现美国独占鳌头的局面。此外,除拉丁美洲的巴西外,即便排除拥有最大规模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也不会使该地区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减少超过 2% (并且,即便排除拥有最大的私营部门的两个国家,这一比例的缩减也不会超过 3%)。我们在各个地区都可以看到,原本大规模的私立高等教育不断分散到越来越多的国家。

私立高等教育在各国分散度的增加大都涉及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占据高等教育扩张和总体分散的大部分,而其私立部门的扩张尤其如此。一些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即便其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总入学人数比例相对较低,但它也建立了大规模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许多拥有大规模高等教育系统的发展中国家(如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拥有大量私立高等教育机构。为什么私立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国家呈现出特有的增长和分散趋势呢?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在高等教育扩张下有限的公共财政。另一个原因在于,尽管大多数发达国家在一个时代经历了惊人的增长,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大多数国家的公立教育占据主导;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社会领域更大程度私有化的时代大大扩展了自己的体系,在高等教育中配备了公私领域兼备的双重选择。

私立高等教育在最大的系统中聚集

但是,对于私立高等教育国家分散的情况而言,它在国家中的分布远非一致。实际上,全球私立高等教育集中在一组国家之中。如果以其平均数量为平均值的话,虽然私立高等教育占全球高等教育总量的 33%,但其

按国家划分的中位数为 20%。仅有三个国家(印度、美国和巴西)占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 40% 以上。事实上,如果以仅包含三个国家(每一组都包括印度)为例,那么,有 17 种不同的国家组合能占到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三分之一。另一方面,即便只有三个国家占据如此高的全球私立高等教育份额,但是这 17 种组合也可以被视为私立高等教育在各国相对分散的又一证据。

私立高等教育国家聚集度最明显的表现是它在大型高等教育系统中的聚集程度。当然,我们可能期望总入学人数和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之间存在某种相关性。世界上最大的 10 个系统(拥有超过 300 万高等教育人口的系统)占全球总入学人数的 58%,而它们占全球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的 69%。如果我们以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而非总入学人数为基准,以此选择入学人数最多的 10 个国家;那么,统计显示这 10 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入学人数占比仅在原先的 10 个国家基础上增加 2%。实际上,前 10 个国家中有 9 个国家将保持不变,而菲律宾将取代土耳其。按降序排列,10 个最大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分布在印度、美国、巴西、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韩国、伊朗、菲律宾和俄罗斯。其中六个国家的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规模大于公立高等教育部门。虽然亚洲国家在这一名单中占多数,但拉丁美洲国家在未来 10 年将会占据多数。

最后的观察结果表明,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集聚与区域集聚同时存在,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本文显示的是,全球私立高等教育的国家配置结合了跨系统的显著分散以及大规模高等教育系统的高度集中。

注:私立高等教育研究项目(Program for Research on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在《国

际高等教育》中设有常规专栏。

阿拉伯世界的高等教育治理及突尼斯案例

Adnan ElAmine

黎巴嫩大学 (the Lebanese University) 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箱: elamine.adnan@gmail.com

阿拉伯世界的公立大学遭受了被称为治理的政治模式 (political model of governance) 的困境。这种模式有关于大学从上到下以及横向上对政治影响的从属关系。它导致思想的封闭、知识生产的破坏, 以及对大学实现社会变革能力的限制。在阿拉伯世界中, 与这一主导模式不同的是突尼斯, 这并非巧合, 该国同时也是“阿拉伯之春”失败的唯一例外, 尽管遭遇了一些挫折, 但仍继续走上民主和渐进式改革的道路。

政治模式

最近在贝鲁特出版的一本编著叙述了 10 所阿拉伯公立大学的历史发展, 这些大学是其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 该书涵盖了这些学校从成立到 2016 年的发展。它表明典型的阿拉伯公立大学属于治理的政治模式, 并且它们主要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改变了以前采用的拿破仑模式。拿破仑模式参考了拿破仑·波拿巴 (Napoleon Bonaparte) (1769~1821 年) 建立的法国体系, 高等教育是集中管理的 (以国家为导向的)、世俗的, 除了在科研机构 (也是集中管理的) 中提供外, 也在不同专业和学术导向的学校中提供。

例如, 1977 年, 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 (Anwar Sadat) 颁布了一项禁止埃及大学政治活动的法律。根据这项法律, 安全人员开始在大学入口处设立检查站并干预大学决策。事实上, 萨达特恢复了纳赛尔时代

(1953~1970) 为人熟知的强大控制权, 而矛盾的是, 埃及却采取了自由经济政策并在外交政策中对西方和以色列保持开放。为了对抗纳赛尔主义 (Nasserism) 在大学内部的持续政治影响, 萨达特依靠保守的伊斯兰势力, 包括教师和学生。下一任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 (Hosni Mubarak) 继续采取同样的做法, 他一直掌权到 2011 年。事实上, 埃及大学仍然是人权观察组织 (Human Rights Watch) 关于侵犯学术自由的许多报道的主题。在同一时期, 埃及的公立大学见证了学生和学者国际交流的减少。同时, 海湾国家针对埃及教授的“借用制度”在 1973 年石油危机之后不断发展。为了增加派往国外的高级教授的数量, 当地博士毕业生的供应量增加, 这导致了学术界的近亲繁殖。此外, 受到接收国保守气氛影响的“借用”教师回归家乡后, 成为新贵并安于现状。

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大学 (Damascus University) 受到执政的社会复兴党 (Ba'ath party) 的安全控制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虽然安全系统要求学者们“保持沉默”, 学术自由受到限制, 但他们也被要求以复兴党的方式发言。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当时在大马士革大学建立了复兴党的一个分支机构, 且在各个学院和部门设有办事处。1970 年颁布的一项法令将教师工会 (一个成立于 1935 年的独立机构) 转变为一个“民间组织”, 其中包括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的所有公务

员。该组织隶属于复兴党。至于学生，他们隶属于“学生会执行办公室”，该办公室是“叙利亚学生全国联盟”的一部分，也隶属于复兴党。所有这些都是根据《大学预防政治活动法》（*the Law on the Prevention of Political Activity*）进行的。

利比亚公立大学的情况类似于叙利亚，带着进一步的超现实主义。它不是采用复兴党的意识形态，而是借鉴了 1969 年至 2011 年统治该国的穆阿迈尔·卡扎菲上校《绿皮书》（*the Green Book*）（1975 年）所宣称的第三世界革命意识形态。这一过程始于 1973 年的国家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卡扎菲宣布“废除现行的所有法律，净化国家”，并承诺“国家的敌人没有自由。”与情报部门合作，该国的革命委员会驱逐了教职员、院长和大学校长。卡扎菲亲自前往班加西大学（Benghazi University）推动这一进程，发表演讲和集会，以清除反对派人士。根据现有消息来源，在大学中心广场上，他参加了由革命委员会学生成员针对被视为人民敌人的学生进行的处决。在卡扎菲之后，大学再次经历了同样的过程，但相反的是，目的是为了清除被指控与卡扎菲合作的人。

类似的政治化的大学治理模式——虽然每种都自有其特点——也可以在也门萨那大学（the University of Sanaa）、黎巴嫩大学（the Lebanese University）、苏丹喀土穆大学（Khartoum University in Sudan）、科威特大学（Kuwait University）和约旦大学（the University of Jordan）中观察到。在海湾国家中，1986 年成立的阿曼苏丹卡布斯大学（Sultan Qaboos University）的例子展现了政治治理模式的一个独特版本：一个家长式的模式。该大学受到苏丹的保护和关怀，保守的价值观占主导地位；从一开始，这就抑制

了知识的开放，同时鼓励自我审查。

突尼斯的例外

突尼斯的公立大学似乎并不典型。它们更接近拿破仑模式。与叙利亚复兴党不同，突尼斯执政的政党——宪法自由党（the Constitutional Liberal Party, Destour）不是意识形态政党；这是一个拥有民间基地的精英团体。它包括来自各种知识背景的成员，也包括左派；事实上，前总统齐内·阿比丁·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任命左派成员穆罕默德·查菲（Mohamed Charfi）为教育部长（1989~1994）。

突尼斯与该地区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足以说明所谓阿拉伯之春的各种结果。第一个区别涉及知识的开放性。突尼斯大学在其课程、组织和智力资源方面曾经且仍对法国大学系统持开放态度。法国书籍、报纸、电视和其他媒体是突尼斯文化和大学生活的一部分，甚至影响了伊斯兰恩纳达党（the Islamic Ennahda Party）。第二个区别与大学领导层的选择有关。2011 年突尼斯依据法律引入了选举制度，并在之后进行了巩固——这与埃及的情况不同，埃及在 2011 年革命后立法，但后来取消了。第三个区别是工会组织主义（syndicalism）的遗产。1967 年，突尼斯建立了一个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联盟，并加入了突尼斯工会（the Tunisian Labor Union），该工会成立于 1946 年，在突尼斯独立于法国统治（1956 年）前就已存在。高等教育联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扩大，这是对在该国转向经济自由主义的一种回应。

治理的政治模式很可能将大学转变为社会化的机构，产出具有确定性、现成答案和忠诚度的精英。由于该地区的特点是社会不平等和紧张局势，反对意识形态潜藏在表面之下，等待着爆炸的那一刻。

高等教育被迫国际化：一种新兴现象

Hakan Ergin、Hans de Wit、Betty Leask

Hakan Ergin: 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CIHE) 博士后学者

电子邮箱: hakan.ergin1@yahoo.com

Hans de Wit: 国际高等教育中心主管

电子邮箱: dewitj@bc.edu

Betty Leask: 澳大利亚墨尔本拉筹伯大学 (La Trobe University) 国际化荣誉教授、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客座教授

电子邮箱: leaskb@bc.edu

今天的世界面临严重的强迫性迁移危机。联合国难民署最近的《年度全球趋势报告》(Annual Global Trends Report) 表明, 每两秒钟就会有一个人成为被迫性移民。目前全球被迫性移民人数为 6 850 万。这些被迫性移民包括资深的学者, 以及本科生和研究生, 他们的教育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打断。他们正在敲开世界各地大学的大门。他们中有些人的声音被理会了, 有些人的声音却被忽视了。大学和政府应该记住过去被迫性移民学者和学生对国家科研和发展以及院校质量的贡献, 例如, 从纳粹德国逃往美国的犹太学者们。

联合国难民署最近的报告《落伍: 危机中的难民教育》(Left Behind: Refugee Education in Crisis) 显示, 在大学就读的难民青年比例为 1%, 远低于高等教育全球 36% 的入学率。令人极为失望的是, 各国政府及其院校没有采取更快的行动帮助大批流离失所者接受教育, 依据《世界人权宣言》(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第 26 条, 接受教育是一项人权。虽然已经取得了一些充满希望的进展, 但这些努力并未在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匀分布。根据难民署的《年度全球趋势报告》, 在联合国难民署授权下, 由于冲突、暴力或迫害而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中有 85% 的人被发展中国家收容。正如土耳其的情况所示, 这些国家在应对自己所面临的全球问题方面所遇到的挑战需要得到进一步关注。

土耳其大学的叙利亚难民

目前, 土耳其拥有超过 360 万叙利亚难民, 这一数字在所有国家中位居榜首。由于叙利亚的战争仍在进行, 因此, 土耳其可能将长期接纳叙利亚难民, 土耳其政府通过战略性国际化土耳其大学的三个功能来重新定位。

为帮助叙利亚难民作为学生进入大学, 土耳其政府改革了学术和财政准入政策。大学被要求接受没有学历资格证明的叙利亚难民为“特殊学生”, 有学历资格证明的难民为“普通学生”。此外, 靠近叙利亚边境的土耳其南部的 8 所大学开设了阿拉伯语教学课程。政府也改变了财政政策, 为叙利亚难民提供政府奖学金并免除其他国际学生需要支

付的学费。根据高等教育委员会（the Council of Higher Education）的报告，这些政策使土耳其大学的叙利亚学生人数急剧增加，从2011年的608人增加到2018年的20701人。

土耳其政府的战略国际化努力也针对叙利亚难民中潜在的学者。2016年，土耳其建立了一个在线平台，即国际学术数据库（the Database for International Academics），目的是为了收集简历。这使在土耳其工作的叙利亚学者人数增加。根据高等教育委员会的数据，在土耳其工作的叙利亚全职学者的数量在过去三年中从292人增加到348人。此外，在同一时期，土耳其大学的硕士和博士项目分别录取了1492名和404名叙利亚难民。

土耳其政府还在战略上将土耳其大学的公共服务功能国际化，以确保既不是潜在学生也不是学者的叙利亚难民能够入读土耳其大学。这使一些土耳其大学向叙利亚难民提供一系列免费服务。这些服务包括免费的土耳其语课程、医疗保健、心理支持和关于儿童保育、难民合法权利和就业能力等重要主题的信息研讨会。

被迫的国际化

以上内容说明了一种新兴现象，即被迫的国际化。土耳其的上述改革在为被迫性移民提供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使大学的政策和功能国际化。那么，被迫国际化的关键特征是什么？它为未来提供了什么信息呢？

与现有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一致，被迫国际化是有意而为的、战略性的，它涉及大学的三大核心功能：教学、科研和服务。但是，它在几个方面有所不同。它回应了本国发生的危机——在土耳其的例子中，数百万叙利亚人被迫迁移，作为学生、学者和/或

公共服务接受者，其中相当多的人将高等教育视为通向更好生活的途径。在过去，高等教育国际化主要是自愿的，是刻意的院校（在某些情况下是政府的）政策的一部分，而这种新兴的国际化形式是“被迫”的。

在学术上，难民带来的多样性和人才收益将提高学习、教学和科研的质量，其他形式的国际化也是如此。在经济上，虽然被迫的国际化不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创收的来源，但历史告诉我们，从长远来看，由于技术移民众多，这些被迫性移民将对院校和国家做出创新和创业贡献。在社会和文化方面，被迫性移民有可能让接收国的社会更加丰富和强大。在政治上，被迫国际化是一种软实力投资，可能会改善接收国与被迫移民本国之间未来的外交关系。

除了传统的国际化的四个机理外，被迫国际化表明了一种新的机理，即一种“人道主义理由”，这是由 Streitwieser 及其同事在2018年提出的。这一理由认为高等教育是个人层面（为了有所需求的个人的利益）、国家层面（为了一国的社会和社区的利益）和国际层面（为了世界的利益）的公益物品。

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将弱势国际群体纳入高等教育体系会带来不同寻常的挑战。接收国社会，特别是在大学入学竞争激烈的地方，人们可能会抵制这种国际化，从而将被迫性移民视为具有不公平优势的竞争者。因此，制定和通过有争议的法律是一项法律挑战。被迫性移民往往不仅需要免除学费，还需要直接经济援助，这是一项经济挑战。在行政方面，评估被迫性移民以前的学术资格也很困难。被迫性移民需要获取有关申请大学的信息，这会带来沟通方面的挑战。语言障碍源自大多数被迫性移民不能熟练使用接收国官方语言。被迫国际化在很多方面与

时间赛跑，要求接收国迅速采取行动，以便在难民中发现并支持最优秀的人才。

尽管存在这些挑战，但我们认为，由人道主义理由驱动的被追国际化可以对被迫迁移做出积极回应。从全球范围来看，“被迫国

际化”将使世界各地的政府和大学以新的方式进行国际化，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远离受危机影响的区域，但在人道主义方面却与它们非常接近。

国际化如何影响学术文化？

Milena Benítez

智利天主教大学 (the Pontifical Catholic University of Chile) 博士研究生、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
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mbenitez2@uc.cl

在全球化的世界中，高等教育系统（即大学和学院）将国际实践融入教学和学习过程、科研以及行政功能之中。后者使他们能够更充分地响应国际需求，例如合作、流动和国际网络的扩展。国际化趋势出现在分散的背景下；也就是说，它们不是固定在特定的文化或学术场所，而是全球高等教育环境积累的结果，导致在更广泛的公共政策议程中建立机制并设定优先事项。因此，国际化的结果、目标、战略、权力关系和为国际化做出贡献的个人分散在全球各地的不同高等教育系统中。最终，国际化进程可能被设想为“不属于任何人，但影响每个人。”然而，如果否认世界一流大学和发达国家教育体系是国际化实践的关键影响者，这可能会遭受质疑。

国际化对内部流程的影响

四个关键机制说明了国际化实践在高等教育系统和院校中的传播，即：排名、合作、学术流动和课程改革。此外，如前所述，世界一流大学对所有四种机制都有明显的影响。这些院校为教学策略以及科研和服务实践制定了国际标准。这就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决定寻求并采用国际化实践的大学内部发生了什么？每所院校独特的内部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都反映在其学术文化中，构成了自己的一套信念、规范、习惯和价值观。大

学“应该是什么”以及“质量是什么”的理念影响了院校和学术优先事项、规范与类型、验证指南以及大学允许、期望和重视的事物。受国际化影响的研究型大学学术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它本身是由世界一流大学的形式和机制引导的吗？

教学过程受到多种影响。关于教学质量、教学策略和评估方法的信念被修改。国际上对什么是“优质教学”的要求和理念可能会与学者们对什么是高素质老师以及在每个学科中教什么的重要看法相互交织——学者们通过自己的本科或研究生经历验证了这些想法。因此，国际化进程带来新的挑战 and 紧张关系。

国际化进程也影响课程决策。诸如本科课程的学习目标、研究生质量以及与国外大学的合作等特征受到影响。所有这些方面均以科研团体如何发现和验证知识为特征，因为国际化进程规定了哪些形式的科研是有效的，以及必须在何处产生和传播有效的科研。这种国际影响力改变了学者在知识生产方面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

排名对科研的影响

在国际化进程中，排名的影响非同小可。它们对学术机构的决定有影响。例如，排名控制了重点的和受资助的科研类型、国际合作形式、知识传播（例如，哪些学术期刊被

认为是相关的), 以及衡量学术产出的方式(例如, 每年学者必须发表的经同行评审的文章数量)。因此, 需要提出一个相关问题: 国际需求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科研的内容和方式?

至于“学术自主权”, 国际趋势无疑会重新确定知识领域的优先顺序, 这些知识领域被认为与学者和学校的最佳定位有关。这种重新排序的部分原因在于索引期刊和具有更多认定价值的特定出版物的数量, 以及通过吸引教授成为受尊敬的期刊编辑组的成员。因此, 高等教育机构可能具有地方自主权, 但它们与国际舞台的互动影响了其如何产出和传播知识。

国际化趋势会战胜当地趋势吗?

在国际化进程中, 当地的需求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国际化趋势会战胜当地趋势吗?

当高等教育机构将注意力转向国际化趋势时, 它们可能会忽视当地的需求和任务目标。一些院校更重视国际认证而不是国家认证, 并将国际排名优先于当地需求和政策以及社会需求。国际化应被视为一种媒介而非目的, 通过国际化, 院校质量和教育过程总体上得到改善, 但这不是将国际化作为最终目标。

总之, 国际化进程无疑会通过教学/学习过程、科研和行政功能中建立新的挑战来影响学术文化。它们还对如何产出和传播新知识产生影响。虽然无疑会带来紧张和冲突, 但国际化应激励学者重新评估其教学和科研策略。同样, 国际化应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及其与当地需求的相关性; 即便是在全球化的压力下也应如此。国际化不应对高等教育机构强加外部做法和标准, 而应成为高等教育机构对地方决策的支持。

印尼高等教育国际化：近期举措及其问题

Agustian Sutrisno

印尼雅加达 Atma Jaya 天主教大学 (Atma Jaya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讲师、2017 年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 agustian.sutrisno@gmail.com

与其东南亚邻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甚至越南）相比，印尼的高等教育是与世隔绝的。学生和教职人员的流动性很低，国内也没有国际分校。2018 年初的两个政府倡议——“欢迎外国教育提供者”和“招募国际学者”表明印尼的情况即将发生变化。然而，这些举措的缓慢进展使人们不得不发出疑问：是什么阻碍了印尼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应该如何改变这种情况呢？

近期的国际化倡议

第一个国际化倡议——“欢迎国际分校”（Welcoming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旨在引进优质的海外教育提供者以改善对印尼人力资源的培训。这些分校的引入也可能带来高等教育部门的竞争，并刺激当地大学提高其质量。尽管如此，不同政府官员针对这些分校校园具体规定的陈述含糊不清。有人说这些校园可以由外国大学全资拥有，而另一些官员则表示分校校园必须是联合投资。印尼媒体报道，到 2018 年中期，将有 10 个分校开始运行，包括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分校，这些分校将坐落于雅加达以外的经济特区。据说，这些校园将被要求教授印尼的强制性科目，如宗教教育和国家意识形态，所提供的课程将主要限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

第二项倡议是“世界一流教授”（World

Class Professors），旨在从世界上最好的 100 所大学中招募 200 位学者。2018 年的这一举措是 2017 年启动的早期项目的改进和扩展版本。早期项目被认为是成功的，因为它通过在印尼大学进行的为期数月的学术休假计划吸引了国际学者。其基本原因是为了提高印尼大学的科研生产力。人们相信，通过引进高效的国际研究人员，印尼学者将拥有合作伙伴，这可以帮助提高其科研质量和国际出版物数量。对于现行的第二期项目，政府预留了大约 1 300 万美元。这意味着每个国际学者每月最多可获得 4 000~5 000 美元，最长期限为三年。重要的是，职业发展的前景有限，因为这些国际学者不大可能会担任管理职位。

这两项举措旨在通过国际化活动提升印尼高等教育的质量。政策制定者似乎意识到需要从国际大学和学术界转移知识，以改善人力资源、提高印尼高等教育的科研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因此，印尼语境中的国际化在很大程度上与质量改进同义。然而，在 2019 年初，这些举措的进展似乎相当缓慢，并且没有任何国际分校在该国运行。

阻碍因素

印尼大学缓慢的国际化进程可归因于国家和组织问题。在国家层面，印尼没有统一的国际化政策。政府一直热衷于在印尼建立

世界一流大学，但从未有明确的路线图。印尼官员关于开设国际分校的过早规划和相互矛盾的陈述表明政策一致性的缺乏。国际化的理由及其在提高印尼高等教育质量方面的作用仍然未知。

在组织层面，许多印尼大学的管理没有经历充分转型，现状文化（*status quo culture*）普遍存在。在学术界，一些大学根深蒂固的赞助制度可能会迫使年轻学者服从高级学者的意志和指导。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学者需要等待很长时间才能获得担任领导职位和改变组织的机会。此外，大学领导者的当选是按资排辈，不一定是因为候选人的组织能力和在管理创新教育项目方面的良好记录，更不用说对国际化做出的努力了。因此，某些大学的组织文化可能不利于培养能够快速应对变化的教职人员。再加上缺乏统一的政策，这些组织顽疾似乎已将高等教育机构变成了行动迟缓的组织，它们不希望政府采取新的国际化举措。事实上，通过大众媒体，许多印尼学者反对上述两项倡议，并将其称为新殖民主义和高等教育不受控制的商业化，而不考虑政府希望提高教育质量的目标。

印尼国际化的命运

印尼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策制定者和大学层面的行动

者。概念化作为质量改进的一部分，国际化能激发印尼高等教育发展的潜力。如果印尼政府愿意制定强有力的国际化政策以提升高等教育部门，那么它可以从邻国的政策中汲取经验。例如，马来西亚如何吸收国际分校可作为一种参考模式——马来西亚引入国际分校使得外国教育提供者能够满足国内巨大的高等教育需求。

然而，考虑到印尼大学对国际化举措的抵制，印尼必须解决的最大问题是改变大学的组织文化和管理。如不做出重大努力，印尼劳动力的未来将处于危险之中。波士顿咨询公司（*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在201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预测，印尼公司将在未来几年落后于人，因为他们无法招募到优秀的人才。到2020年，招聘初级候选人都将很困难，因为只有一半的职位需求将得到满足。在高级管理层，印尼劳动力将没有足够的全球影响力和领导才能来跟上区域和全球竞争。为了改变大学的管理和文化，印尼可以学习其亚洲邻国的政策。中国的211和985工程适用于印尼环境，特别是关于中国如何推动主要院校转型以帮助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经验。从邻国经验中学习的意愿可能是改变印尼高等教育和使其国际化的关键所在。

印度迈向国际化的缓慢步伐

Pushkar

印度果阿国际中心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Goa, ICG) 董事兼首席执行官

电子邮箱: pushkar@incentgoa.com

在印度, 政府官员和许多大学领导人越来越认为印度大学需要在国际化方面做出重大改进, 特别是在国际学生和教师方面。这种正在形成的共识部分是由于印度大学在世界各大学排名中的表现持续不佳。只有少数印度院校跻身全球 500 强大学之列。少有大学, 通常是不超过一、两所大学偶尔会出现在 200 强榜单中。印度大学在世界排名中的糟糕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科研生产方面的缺陷, 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是如此。此外, 大多数院校, 包括著名的印度理工学院 (Indian Institutes of Technology) 的各个分支机构, 在国际化方面都不尽如人意。印度大学没有吸引更多国际学生的原因之一在于大多数院校教育质量差, 但其他因素也有影响, 包括官僚主义障碍和公立大学对国际领域的漠不关心。

现在, 印度官员认为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 该国的大学将提高它们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地位。出于这个原因, 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 政府和印度理工学院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和教师。

现有数据

印度有 903 所大学和近 5 万所学院和其他类型的学位授予机构。在最近一次统计中, 有超过 3 600 万名学生在这类院校注册, 这一数字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增长。但是, 国际学生只占总人数的一小部分。2010~2011 年,

印度有 27 531 名国际学生。这一数字在 2017~18 年增加到 46 144, 增加了 67%。虽然这种增长可能看起来很显著, 但事实并非如此。仅在美国, 2017~2018 年就有超过 20 万印度学生。成千上万的印度学生在其他西方国家学习, 包括非英语国家。非西方国家也成为热门目的地。超过 18 000 名印度学生在中国学习, 这一数字超过在英国学习的印度学生, 且预计会继续增长。最后, 尽管印度高等教育的国际学生人数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 但他们仍占学生总数不到 0.2% 的比例。

印度大学的外国教师人数也很少。例如, 在印度理工学院 23 个分支机构中仅有 40 名国际教师。这还不到所有教职员工的 1%。一些私立大学在招聘国际教师方面做得相对较好, 但总体而言, 印度高等教育机构的外籍教师人数太少。

吸引国际学生的新举措

印度政府很晚才意识到世界排名中的大学会带来声望, 同时也是软实力的源泉。为此, 印度政府于 2016 年启动了一项新倡议, 以提升其世界舞台上的最佳大学。所谓的“杰出院校倡议” (Institutions of Eminence initiative), 这有点类似于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的 211 和 985 项目。这一倡议旨在确定 20 所知名大学, 其中, 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各十所。这些著名院校将拥有几乎完全的自治权, 因为许多人认为政府对当前低迷的高

等教育状况负有责任。除此之外，这些大学被允许招聘更多的国际教师，高达教授总数的 25%。印度政府的期待在于：知名大学将随着时间推移提升其世界排名位次，并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从而进一步提升其排名位次。然而，该倡议仍处于缓慢进展之中，迄今为止仅选出了六所院校。

政府在 2018 年中期采取的另一项举措是“留学印度”（Study in India）门户网站，旨在方便国际学生选择合适的印度大学。据负责教育领域的人力资源开发部长 Prakash Javadekar 称，“印度可以成为外国学生负担得起的教育中心。”政府的目标是在五年内将国际学生人数增加到 20 万。为实现这一目标，官员们宣布，针对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学生，在各院校提供的 15 000 个招生总名额中，有 55% 的人将获得基于成绩的不同程度的学费减免。

除了“留学印度”计划外，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是所有印度理工学院分支机构最高决策机构，它决定每个学院可以自由地设定国际学生学费。理念在于，每个学院都可以收取有竞争力的低学费以吸引该地区及其他地区的低收入国家的学生。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学院通过大幅降低国际学生的学费（特别是研究生学习）在实施这一举措上一路领先。

吸引国际教师的举措

2018 年 11 月，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教师，印度政府放弃了对这一群体的所有相关安全许可要求。这解决了印度官僚机构进度缓慢的问题；实际上，当批准过程持续数月时，感兴趣的院校和国际教师都已失去兴趣。大学现在可以直接雇佣外国人，不需要从内政部和外务部获得许可。强制许可现在仅限

于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优先参考类别”（Prior Reference Category）国家的外国人。政府还允许印度人持有外国护照，这些护照也被注册为印度海外公民（类似于第二本护照），无需经过内政部和外务部的审批即可被任命为终身教职人员。

出于自愿，印度理工学院同意以集体方式主动地寻找外国教师。印度理工学院理事会决定，每个成熟的学院都将负责从一个或多个地理区域招聘外国教师，既是为自己招聘，也是为其他学院招聘。例如，美国分为三个区域，分别分配给了印度理工学院—孟买学院（负责美国西海岸），印度理工学院—德里学院（负责美国南部）和印度理工学院—马德拉斯学院（负责美国东海岸）。该战略似乎令人费解，但确实表明印度理工學院在积极招聘更多国际教师这件事上用心良苦。

结语

印度政府和某些公立院校（即印度理工学院）最近采取的这些举措不太可能立即取得成功。即便有针对外国学生的激励措施，但“留学印度”门户网站仍不足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印度。印度大学肯定需要在国外更好地进行宣传。目前，一些私立大学积极寻求吸引来自非洲国家和其他地方的学生，但目前还没有更广泛的战略来促进“留学印度”。此外，由于大学的住宿设施较差，种族主义和犯罪横行，因此，即便是在大城市，整体生活条件对外国人而言也充满了挑战。

对于国际教师而言，印度理工学院将努力为潜在的教师提供有竞争力的薪酬。此外，许多学院位于偏远地方，不能提供大城市的舒适生活。因此，这些地区不太可能对外国人有吸引力。位于孟买和新德里等大都市的

印度理工学院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例如，印度当前政治的性质也可能阻碍学生和教师来到印度。新德里的有毒空气成为世界头条新闻，这也是阻碍外国人到印度的主要因素。最后，印

中国高等教育批判性思维与意识形态

杜晓馨

华东师范大学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国家教育政策研究所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博士后研究员

电子邮箱: xxdu@connect.hku.hk

有些人可能认为中国大学缺乏学术自由,因为它们在各方面受到政治控制。例如,学生学分总数的 10% 必须来自政治教育课程;学术人员需要对他们的言论保持谨慎;在课堂上讨论某些历史事件是禁忌。然而,这些因素和其他政治社会化机制并不一定会消除在保持学术自由方面大学所做的努力。为了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全球声誉,国家鼓励中国大学创新、推动批判性思维,正如人们对世界一流大学的期待一样。上海复旦大学 (Fudan University) 是一所顶尖大学,在追求学术卓越和争取大学自治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因此,它是审查大学政治和学术使命之间紧张关系的理想案例。本文基于作者在 2014 年进行的实地考察,使用混合数据收集方法,包括文件审查、问卷调查、观察和访谈。

不同的预期

国家、大学管理层和学生对复旦大学学术人员的不同期望可能会造成一定的矛盾。

就其本身而言,国家期望复旦大学以及中国所有的大学,作为受国家监管的实体,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学术优势,同时在政治上值得信赖且服务于国家的发展需求。国家对学生教育目标的期望可以以 20 世纪 50 年代的口号“红与专”为特点。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希望学生成为其所在领域的专家,同时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建设者。

为了响应这些国家预期,复旦大学专注于教师培训。与此同时,复旦大学校长最近的讲话——关于大学寻求真相的责任,在学术上保持独立,并保持其工作人员的思想自由,表明该大学希望享有某种程度的学术自治权。

复旦大学的学生表示,他们的情绪很复杂。他们中有人认为,政治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其他人认为这对学术自由有一定的障碍。一般来说,学生希望老师在课堂上培养批判性思维能力。

教师作为政治社会化的实施者

复旦大学的教师通过认识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标准来实行自我审查,从而发挥政治社会化实施者的作用。他们在大学的教学经验使他们了解了在课堂上可以或是不可以讨论的政治敏感话题和历史事件,自我审查时所使用的规程中也包括了这些。

政治标准的核心是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无论教师讨论什么话题,他们都不会挑战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考虑到这些规则,教师们提出了自我审查策略,使他们能够悄悄地发挥学术自治权,同时又不在于技术层面违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正统观念。

教师作为学术自由斗士

尽管他们意识到政治底线,但复旦大学

的教师通常可以通过鼓励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来追求学术自由。例如，教师经常在课堂上讨论西方价值观，包括西方政治制度和社会价值观的优势。

即便是在政治教育课程中也鼓励批判性思维。它可以帮助学生了解平衡观点的重要性，并使他们能够提出不同的观点。一些复旦大学教师鼓励学生寻找不同的非官方信息来源，以便能够以更开放的心态讨论学术问题。教师还在课堂上促进讨论和辩论以激发批判性思维。

角色分裂现象

角色分裂现象是由于国家、大学和学生

的期望之间的竞争而产生，并且是在中国高等教育系统的政治限制内保持学术自由的策略。在他们的互动中，教师扮演着带有不同责任的不同的角色，采取不同的策略，并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不同的，甚至是差异巨大的行为。有时，他们遵守政治标准，并在国家规定的范围内工作，特别是有关政治事务的界限。

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这些理解，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管理的界限可以由教师通过角色分裂策略来应对，这是解决政治管理与学术自由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并允许在高等教育课程中包含其他观点。

中国“青年千人计划”人才及其科研生产力

杨力蒴、Giulio Marini

杨力蒴：英国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教育系（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全球高等教育中心（Centre for Global Higher Education）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lili.yang@education.ox.ac.uk

Giulio Marini：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全球高等教育中心研究助理

电子邮箱：g.marini@ucl.ac.uk

实施人才招聘计划已成为许多希望吸引国际研究人员的国家所广泛采取的策略。未能招募国际人才和/或保留国内人才的国家面临严重的人才流失风险。精心设计的人才招聘计划，提供极具吸引力的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有助于将人才流失转化为人才引进。

在千禧年之前，中国是一个面临人才流失挑战的国家。为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政府连续发布了吸引海外华人和外国人才到中国的政策。始于 2011 年的“青年千人计划”（简称“青千计划”）可谓是这些计划中最具影响力的，该计划旨在从海外招募职业生涯早期和中期的研究人员。青千计划提供有吸引力的就业条件，以招募有潜力成为领导者的海外年轻人才（40 岁以下的博士学位拥有者）。从 2011 年到 2018 年，青千计划资助了大约 4 000 名在中国的研究人员。他们大多数都是中国海归。人们普遍认为，海归人才可以有效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但海归人才的研究成果还未与继续留在其他研究密集型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中国学者相对比。基于国际比较视角，探究中国是否真的为科研人员提供了更好的研究条件是个相当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比较了 2011 年和 2012 年的“青千”人才（实验组）和在美国研究密集型大学工作的中国研究人员（控制组，其数据是为了

本研究而从院校网站手动提取的）。该对比试图发现“青千”人才是否能够以其美国对比组人员相似的速度和相同的质量发表文章。实验组共包括 183 人，而对照组包括 363 人。虽然“青千”人才在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中工作，但对照组的所有研究人员都在研究型大学工作。两个群体在年龄和学科方面都是接近的（生命科学、工程和材料科学、化学、数学和物理科学、信息科学、环境和地球科学、医学、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对照组人员被分成两个组，以便与“青千”人才进行比较。

在发文速度上表现相同

所有选定的研究人员都在 2006 年左右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五年中，两个小组在发文数量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2013 年，“青千”人才的平均出版物数量为 27.1，而对照组为 25.7。回到中国后，到 2018 年，“青千”人才的发文量增加到 39.0，而对照组的研究人员则为 39.4。尽管“青千”人才的发文量的增幅略低于对照组的研究人员，但我们并未发现显著的差异。

关于出版物的类型，在招聘后，“青千”人才 84.8% 的出版物是期刊文章（其他产出是会议论文、书籍章节或其他文章）；而在对

照组中，这一比例为 76.1%。两组都没有针对开放存取发表方式的明确偏好。这两组人员的开放存取出版率在这一时间点上都有所增加，“青千”人才组从 3.7% 增加到 6.9%，在美的中国研究者组则是从 4.6% 增加到 6.6%。

发文质量略微落后

虽然出版物总量上的表现相似，但“青千”人才组在出版物质量（期刊影响因子）方面略落后与对照组，尽管两组人员在排名前 25% 的期刊上的发文数量上没有明显差异。但是，在影响因子方面，“青千”人才倾向于在声望较低的期刊上发表文章。并且，他们在使自己的文章被引用上更为成功。具体来说，“青千”人才在回到中国之后，其被引用的文章占 78.29%。在同一时期，在美的中国研究者则是有 73.8% 的成果被引用。

描述性统计数据还表明，在被招募回国后，每位“青千”人才文章的平均引用率（12.225）低于对照组（15.931）。关于出版物认可度，我们通过累计引用量来衡量，“青千”人才组似乎落后对照组。此外，虽然“青千”人才非常注重与国际合作伙伴的合作出版物，但他们回国后的国际合作率明显下降。在返回中国之前，“青千”人才 56% 的出版物涉及国际合作。在他们入选“青千”人才计划后，这一数字降至 44.8%。与此同时，对照组保持了相当高的国际合作率（在 2011 年和 2012 年之前为 66.2%，之后为 65.6%）。

结语

总的来说，“青千”人才计划在吸引一些最优秀的海外华人回归中国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正如“青千”人才的毕业院校清单所显示的那样，他们大都在海外世界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大多数“青千”人才在中国顶尖大学或研究机构工作，拥有相当丰厚的科研经费和特许的工作条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在获得财务和硬件支持方面优于对照组。

尽管如此，中国院校设定的条件值得进一步考察，特别是有关为“青千”人才设置的评估方案。根据该计划，“青千”人才的主要任务是每年在著名的国际期刊上发表高质量的文章。虽然“青千”人才成功地保持了与对照组相似的出版速率，但由于发文压力很大，其文章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

这就将我们的视线聚焦在了中国科研绩效的评估系统。在中国，“追赶的冲动”是普遍存在的，这也影响着国家提高科研能力的国家和院校战略。政府和院校都强调短期回报，特别是科研出版物的数量和目标期刊的影响因子。然而，尽管在排名前 25% 的期刊上发文和文章数量备受关注，但每篇文章的质量却不是主要关注点。虽然对短期回报的重视极大地促进了研究成果的增加，但可能会阻碍更为可持续的强调质量的学术文化的发展。它也可能妨碍密集出版不太可能的学术领域的发展。可以说，中国的下一步不是要解决财政或人才短缺问题，而是要克服其追赶和追求短期回报的心态。

中国留学生：事实、路径和挑战

周洋、Hans de Wit

周洋：中国南京农业大学（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公共管理学院（the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博士研究生、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访问学者

电子邮箱：361698058@qq.com

Hans de Wit：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教授、主任

电子邮箱：dewitj@bc.edu

高等教育国际化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流趋势，国际学生流动性是一个重要指标。2018 年，国际教育协会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显示，2017 年与 2001 年相比，八大留学目的国的排名发生了很大变化：美国仍排名第一，但比利时、日本、西班牙已经从名单上消失了。德国的排名下降，而英国和法国的排名保持不变。中国和加拿大分别排名第三和第六位，澳大利亚从第五位上升到第四位。该报告显示，自 2001 年以来，中国在吸引国际学生方面的表现显著提升。本文详细阐述了这一最新发现，并借鉴了中国教育部的一份报告。

事实

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2000 年至 2015 年中国国际学生统计报告，留学生人数从 2000 年的 52 150 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397 635 人。亚洲是最大的留学生来源地：2015 年，60.40% 的国际学生来自亚洲国家。第二大来源地是欧洲，占中国所有国际学生的 16.79%。相反，非洲学生占总人数的 12.52%。来自美国的学生比例为 8.79%，大洋洲的比例为 1.51%。

至于留学生原籍国，韩国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向中国输送最多的留学生，自 2008 年以来，美国一直是第二大来源国。2015 年，韩

国向中国输送了 66 627 名（占比 16.77%）学生，向美国输送了 21 975 名学生（占比 5.53%）。近年来，来自印度、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泰国、越南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国际学生人数急剧增加。

在学术水平方面，虽然非学位生的比例自 2000 年以来一直在下降，但这一群体仍占多数。2015 年，非学位生的比例为 53.53%。2015 年，本科生的比例增加到 32.17%，而研究生的比例为 13.47%。

从 2000 年到 2015 年，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学生比例略有下降。2000 年，10.28% 的学生获得奖学金，而 2015 年这一比例为 10.21%。

国际学生就读的排行前五的专业包括文学、中医、工程、西医和经济学。在过去 15 年中，学习文学的学生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有 53.60% 的学生学习这一专业。同时，学习中医的学生比例从 2000 年的 7.09% 下降到 2015 年的 3.09%。学习工程、西医和经济学的学生比例增加，西医最具吸引力，占 8.75%。攻读工程学和经济学学生比例分别达到 6.56% 和 4.70%。

路径

有多个中国的奖学金计划可提供给国际

学生，如孔子学院奖学金（the Confucius Institute Scholarship）计划和地方政府奖学金。中国政府奖学金是最重要的项目，特别包含了生活费和医疗保险。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学院奖学金计划近年来变得越来越重要。2016年，中国有多达8 840名获得孔子学院奖学金的留学生。此外，中国的一些省份也设立了地方政府奖学金。

例如，江苏省设立了“茉莉花留学江苏奖学金”，北京市政府启动了北京政府留学生奖学金以支持在京留学的优秀留学生。孔子学院是中外教育合作的新形式。例如，“孔子学院是中国研究计划”（Confucius China Studies Program）是一项针对留学生在华学习的学习计划。2016年，该计划招募了来自26个国家的72名学生攻读联合培养博士学位或攻读博士学位。

中国的大学提供许多英语授课课程。根据中国教育部的数据，2009年，中国34所大学开设了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商务与管理、工程、社会科学、人文等领域研究生课程。中国留学基金委网站显示，2018年有100多所大学开设了英语授课课程。

对于想要吸引更多国际学生的国家而言，提供工作许可证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战略。在获得许可后，中国的国际学生可以留下来工作。上海、北京和广州已发布有关如何申请工作许可证的信息。最近，中国政府决定成立“新移民局”（New Immigration

Bureau），专注于国际学生的移民。

国际学生人数的增加是中国与其他国家经济和教育合作的结果。中国于2013年启动了“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促进与亚洲和非洲国家以及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和教育合作。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在华留学生数据，超过60%的学生来自“一带一路”地区，未来几年还将有更多的留学生来自这一地区。

挑战

如上所述，中国采取了多项措施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但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挑战，特别是获得奖学金的国际学生人数有限。中国教育部发布了一份允许向国际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大学名单，但名单非常有限。这削弱了中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竞争力。

对于国际学生来说，汉语很难。近年来，中国的大学为国际学生开设了英语课程，但效率很低。大多数教师仍使用中文教学。虽然中国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汉语课程，但他们的熟练程度仍然不足。

移民和工作机会也很有限。大多数国际学生渴望移民或在留学目的国工作——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虽然中国政府修改了允许国际学生毕业后工作的要求，但迄今为止只有三个城市公布了如何申请工作许可证的细节。如果政府想提升学生在中国留学的兴趣，它就必须集中精力解决这三个问题。

老挝与柬埔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

Martin Hayden

澳大利亚南十字大学 (Southern Cross University) 教育学院高等教育学教授

电子邮件: martin.hayden@scu.edu.au

想要总结老挝和柬埔寨高等教育面临的挑战存在着一些障碍。一个是仅在表面上讨论这个话题的风险。另一个是不充分承认每个国家的文化、历史和政治环境独特性的风险。除这些问题外, 本文旨在确定两国在高等教育系统方面共同面临的三大挑战。

环境

老挝和柬埔寨目前正在经历快速和持续的经济增长, 主要基于对其自然资源的开发、制造业的发展以及新服务部门的出现。然而, 以国际标准衡量的话, 这两个国家仍然相对贫穷。每个国家中都存在极大的收入不平等, 而农村地区的贫困程度尤其高。腐败在两国中无处不在, 在高等教育部门内也是如此。

过去 15 年来学校保留率的显著提高导致了对高等教育需求的激增。在这两个国家中, 公立高等教育部门都无法满足激增的需求。因此, 政府允许私立高等教育部门迅速扩张, 它们不会受到太多控制。在柬埔寨, 这一政策得到了更为积极的推动, 私立高等教育部门现在比公立高等教育部门规模更大。

2015 年, 也就是可获得可靠数据的最近一年, 拥有 600 多万人口的老挝有五所公立大学, 八所公立学院和 43 所私立的学位授予学院。老挝还有超过 90 000 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其中约三分之一就读于私立学校, 但大多数是非全日制学生。

柬埔寨的人口超过 1 500 万, 它拥有 109

所大学和研究所, 其中包括 66 所私立大学和学院。柬埔寨拥有约 26 万名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 其中一半以上就读于私立院校。

院校自治

两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需要更多的院校自治。在每个国家中, 公立大学都有必要的治理委员会结构来行使院校自治权, 但其理事会和学术委员会几乎没有决策权。在老挝, 即使是对培训计划的适度改变也必须得到教育和体育部的批准; 在柬埔寨, 情况类似, 只是公立大学由多达 15 个不同的部委进行直线管理, 并由教育部、青年和体育部协调。因被指定为“公共行政机构”, 柬埔寨的九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仅有有限的财政自主权, 但老挝还没有这种进展。

两国都普遍感受到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缺乏自主权的后果。学术管理者感到被国家官僚机构的负担所拖累。在决策过程中也存在避免风险的文化。

相比之下, 两国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或多或少独立于国家控制。这些院校主要由利益驱动, 由富有的个人或家庭经营。私立院校的治理结构是公司化的, 但通常是其所有者确定院校的战略重点。

资源

两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对更多资源的需求。由于老挝和柬埔寨是低收入国家, 公立高等教育的预算不可避免地受到

限制。然而，预算限制非常严格，以至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教室、图书馆、信息技术网络和科研实验室的质量提高属于特例而非规则。两国都致力于在其教育系统上投入更多资金，但每个国家都对建立幼儿教育、小学和中学教育部门做出了重大承诺。增加向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流被认为很难实现。

两国都制定了一项政策，即严格控制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费。捍卫这项政策是因为不希望家庭困难的年轻人无法负担公立高等教育。然而，这一论点很少得到关于目前就读于公立高等教育机构的学生的社会经济状况数据的支持。其中许多学生被广泛认为是来自富裕家庭，有能力支付更高的学费，但这种观点经常遭到两国政府的否认。

私立教育机构收取的学费比公立教育机构收取的学费高出许多倍。这种情况使公立院校的学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发现私立院校提供的培训项目往往与公立院校提供的培训项目相同。此外，在私立院校授课的学者往往是公共部门的学者，他们为了增加收入而“兼职”。公立院校学者也认为，人们对私立院校所提供的更昂贵项目的需求似乎并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增加公立院校课程项目的学费且不会产生不利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在更多的奖学金可用于支持贫穷家庭学生的情况下。

质量

两国高等教育面临的第三个挑战是需要

提高质量。在两个国家中，学者的资质都不符合国际标准。例如，在老挝，只有不到5%的学术人员拥有博士学位。教学技能也不强，很少或没有专业的支持来协助教学改进。在这两个国家中，官方都期望公立大学的学者参与科研。然而，这些院校的科研生产率仍可以忽略不计，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学术界既没有技能也没有资源参与重大的科研项目。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更愿意通过接受额外的教学任务来补贴其微薄的工资。

这两个国家都采用了全系统的质量保证政策和程序，但实施起来非常缓慢，迄今为止没有太多关于其影响的证据。但是，政府部门确实公开承认存在与质量有关的问题。两国越来越关注的是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与高等教育机构提供的培训项目之间存在的匹配现象。同样值得关注的是偶尔出现的有关过度贪心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丑闻。

结语

当然，这里所说的老挝和柬埔寨高等教育面临的三大挑战是相互关联的，这意味着为了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这三个挑战很可能需要同时解决。在这两个国家中，有关改革需求的官方言论为精心制定的计划和指导方针奠定了基础。但奇怪的是，这两个国家的高等教育系统缺乏改革动力。在任一国家中都不存在政治意愿的力量，这一点很难避免，但人们需要这些政治意愿推动必要改革以使高等教育在未来几年蓬勃发展。

越南的毕业生就业

Linh Tong

匈牙利中欧大学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公共政策学院 (th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 Tong_Linh@spp.ceu.edu

教育被视为失业不可或缺的解决方案。当一个国家面临经济衰退或希望改善其经济表现时,最有可能的首选措施之一就是增加对教育的投资,特别是对高等教育和研发的投资。尽管人们对“教育福音”抱有持续的信念,但是,在证明自己有确保毕业生的就业能力上,全世界的高等教育机构现正面临着巨大压力。在越南,压力从越南政府向高等教育机构自上而下蔓延,现在高校需要提供就业率统计数据,以履行《2011~2020 教育发展战略》(the 2011~2020 Educ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中规定的任务。到目前为止,结果是无效的,因为高等教育机构只是回应政府的压力,而不是根据有利的就业统计数据积极提高自己的声誉。

越南经济中的技能不匹配

自 2007 年 1 月开始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越南经济经历了广泛的结构性改革以适应不断增长的一体化和全球市场需求。“现代化”和“工业化”已成为国家格言,伴随着私营部门不断扩大而来的开放市场逐渐取代了中央计划模式。结果,很大一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向制造业和高技能部门。此外,“知识型经济”的概念已纳入《2006~2010 年国家发展计划》并已成为越南教育改革的主要指导方针,这带来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学历需求的激增。拥有高等教育

学历求职者的供给很快超过了雇主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人们开始质疑高等教育的相关性。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毕业生未能获得与其学历相匹配的工作。

强制公布就业率

为了鼓励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竞争和质量提升,教育和培训部强制要求高等教育机构在学生毕业后的 12 个月内(从 2018 年 1 月开始)公布各自毕业生的就业率。根据 05/2017/TT - BGDĐT 号通知,未能公布所需信息的大学和学院将被禁止招收新生。就业率的公布有可能帮助学生和家庭做出明智的教育选择。

高等教育机构公布就业率的倡议并非越南独有,许多国家也进行了类似的尝试,例如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英国和美国等。在这五个例子中,澳大利亚、新加坡、韩国和英国通过由第三方监督机构进行的全国范围的调查收集信息。然而,美国排名由美国新闻社管理,这是一个分红制的多平台出版机构,它更依赖个别大学对其统计数据的自我报告。在全球范围内,QS 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the QS graduate employability ranking)被认为是比较全球 500 所不同高等教育机构毕业生就业率的最好工具。但是,如方法所示,统计数据是基于自我报告机制。《泰晤士高等教育》(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还

发布了全球大学就业能力排名 (Global University Employability Ranking), 该排名评估了来自33个不同国家的150所大学的毕业生。

不可靠的就业统计数据

截止2018年4月, 64所越南高等教育机构根据需要公布了校友的就业率。根据公布的统计数据, 西北大学 (Tay Bac University)、鸿德大学 (Hong Duc University) 和海防大学 (Hai Phong University) 等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30%至70%) 远低于大城市和首都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率 (超过80%)。然而, 公布数据的高等教育机构仅占越南高等教育机构总数 (306所) 的不到20%。此外, 已公布的统计数据因不可靠而受到批评。在64所大学中, 34所院校报告其就业率高于90%, 10所院校报告其就业率为70%至90%, 其余院校为40%至70%。

人们认为毕业生就业统计数据被夸大了, 因为2017年12月劳工部的报告称总失业人数中的五分之一 (107万人中的237000人) 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因此, 问题在于当64所大学公布的就业率如此之高时, 为什么还有多达23.7万名失业者?

人们对于财经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和消防大学 (the University of Fire Fighting and Prevention) 也存在质疑, 两所院校都声称具有100%的就业率。批评家们想知道大学自我报告所使用的样本量是否足够大且具有代表性。例如, 在2017年9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 西贡大学 (Saigon University) 得出的结论是, 其电气工程技术和电子学领域毕业生的就业率是100%, 而这仅是基于单一回复。目前还不清

楚什么样的工作被视为就业。在越南, 许多毕业生的工作领域与其专业不相匹配; 一些毕业生拥有专业教学学位, 但毕业后成为纺织工人。

可能的解决方案

针对没有专门化的认证机构进行就业调查的国家而言, 对就业统计数据不可靠性的关注很常见。无论何时, 只要是涉及高等教育机构的自我报告, 人们都怀疑数字是否真实可信。在国家机构监督下第三方进行的就业调查被认为更加可信和客观。越南媒体的一些文章对该国新政策的有效性表示怀疑。看来公众希望实施国家规定。为了解决对就业统计可靠性的担忧, 人们强烈建议教育和培训部亲自进行全国就业能力调查, 或是建立一个可靠的机构来监督调查过程, 而不是将这一工作留给大学。此外, 为增强向学生提供的就业信息的可信度和质量, 教育和培训部应要求大学报告其毕业生的平均收入。

目前, 大多数越南高等教育机构将公布就业统计数据更多地作为一项需要满足的政府要求而非作为提高其质量排名位次的黄金机会。换句话说, 越南高等教育机构尚未习惯于在竞争激烈的教育市场中向独立企业一样运作, 在教育市场中, 客户 (学生和家長) 会审查就业统计数据以做出决策。因此, 当公布就业率被院校认为是一件必须完成的事而非是一种需要时, 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压力以降低失业率的计划就不会成功。正如最近在《国际高等教育》中的一篇关于越南高等教育自治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 这是中央计划教育体系现状的必然结果。就业数据成为激励越南高等教育改善高等教育质量的有效工具还需要很长时间。

巴拿马：高等教育是关键所在

Philip G. Altbach、Nanette A. Svenson

Philip G. Altbach：美国波士顿学院国际高等教育中心研究教授、创始主任

电子邮箱：altbach@bc.edu

Nanette A. Svenson：巴拿马全球发展与教育顾问

电子邮箱：nanette.svenson@gmail.com

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巴拿马一直是重要的区域和全球十字路口，巴拿马运河就是明证。建于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巴拿马运河对全球商业和国民经济至关重要。国际金融、运输和物流以及旅游和其他服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三以上，除了依赖地理外，这些经济驱动因素还有其他共同点：它们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力。但是，讽刺的是，巴拿马拥有该地区最弱的教育体系之一。更糟糕的是，该国在纠正这种情况方面所做的工作相对较少且缺乏针对国家核心力量对国家未来重要性的集体意识。这种自满情绪可能是由于过去十年中其引人注目的成绩：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 7%，巴拿马城及其周边地区的基础设施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然而，这种成功或许是不可持续的。

巴拿马喜欢与新加坡相提并论。这两个国家都很小、人口众多、物质资源有限且有较优的国际地位，因此可以基于国际服务建立有价值的利基经济体。但新加坡从一开始就成功地把重点放在教育上，为的是经济增长和主要基于人力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但巴拿马却没有这样做。因此，巴拿马更像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个国家多年来一直依赖单一的自然资源，最近才承认需要实现经济多元化，阿联酋一开始过度依赖进口人才和产品，最近才认识到改善其教育体系以创造

更高效的国家劳动力的重要性。巴拿马必须吸取经验。

巴拿马高等教育体系的概况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巴拿马的大学数量大幅增长，除五个公立院校和一个天主教院校外，新增的院校主要是私立院校。公共注册中心列出了 100 多所大学；不到一半数量的大学得到了当局的承认，其中更少数量的院校得到国家或国际认证机构的认可。巴拿马高等教育入学人数约为 40%，但完成率要低得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巴拿马人口中有 13.5% 拥有学士学位，2% 拥有硕士学位，0.3% 拥有博士学位。粗略统计下来，三分之二的学生就读于五所公立大学，其中最古老和规模最大的是巴拿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Panama），其他最近建立的大学是在巴拿马大学以前的部门或区域中心的基础上建立的。私营部门的入学人数仅占总入学人数的三分之一，但却是增长最快的部门。大多数大学都位于首都及其周边地区，其他几所大学分散在另外几个大城市中。

主要困难

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一样，巴拿马资金不足，忽视了各个层次的学校，且主要关注覆盖范围而非学生的学习成果。因此，公立

学校通常质量低下，无法提供年轻人需要在高等教育中取得成功或直接参与服务型经济所需的技能。能够负担高等教育的家庭将其子女送到私立学校以为其获得更好的就业机会做准备。这导致了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和日益两极化的社会结构。

大学和科研部门尤其处于不利地位，它们管理不善、资源匮乏。尽管大学数量众多，但却很少有质量良好的大学，且没有一所大学接近“世界一流”的标准，且与其他拉美院校相比，大多数院校都没什么优势。这部分反映了资源分配。巴拿马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7%用于高等教育，不到美国和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投入比例的一半。其中大部分都分配给巴拿马大学，这所大学因为其腐败历史、低效管理和过时的课程而臭名昭著。科研经费也很少。在过去十年中，巴拿马仅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0.1%~0.2%用于研发，比经合组织平均水平低约20倍。基于这样的情况，加之低水平的研究生培训以及巴拿马高等教育的传统教学方向，巴拿马很难产生科研文化。

巴拿马还要努力克服高度官僚化和政治化的法律环境，这一环境限制了创新和发展。巴拿马的教育部是政府机构中规模最大、功能最失调的部门；国家宪法将所有高等教育规划授权置于收到质疑的巴拿马大学的直接控制之下；2006年成立的全国高等教育认证评估委员会（the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ccreditation and Evaluation Council）刚刚开始在该领域发挥作用。

有吸引力的资源

巴拿马也拥有一些资产，它可以更好地利用这些资产来扭转这些乏善可陈的趋势。知识之城（City of Knowledge）是一个位于前

巴拿马运河区的学术经济自由区，它拥有无与伦比但未得到充分利用的资源。这一地区是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以及许多其他国际组织）的所在地，还有几个研究中心、学校和外国大学，包括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分校。这些机构大都拥有最少数量的长聘教师，且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研究，但它们为国家高等教育提供了国际补充。根据法律，知识之城不受教育部和巴拿马大学监管的影响，这是一个巨大优势；并且，它还拥有国家科学秘书处（the National Science Secretariat），这是一个负责推动科学研究和创新的自治机构。国家科学秘书处的预算和人力资源有限，但仍已开始建立促进科研活动的协议和流程。巴拿马第一个官方生物医学研究中心是另一个自治的公私合作实体，也位于知识之城，且已在科研、博士培训和国家能力建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主要是与国际合作伙伴合作。通过额外的公共和私营部门支持，巴拿马可以更好地利用所有这些知识之城资产。密切合作——这也是知识之城的机构间所缺乏的东西，将有助于提高生产力。

展望未来

三个宏观元素和各种较小的举措是扭转巴拿马高等教育的关键。首先，政府和社会需要承认高等教育对可持续性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其次是迫切需要消除国家体制中盛行的、令人窒息的政治、法律和官僚障碍。巴拿马大学必须从高等教育监督中脱离出来，高等教育和科研的公共资金必须不再局限于巴拿马大学之中。第三，提供充足的资源至关重要，巴拿马有能力支持并发展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需求的高质量高等教育机构和研发服务。鉴于巴拿马几十年来的经济成就，

忽视这一点是不可原谅且愚蠢的。

私立高等教育可以在巴拿马的高等教育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已经有所体现了。对所有院校而言，相关的质量控制和创新自由是不可或缺的，尽管目前两者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证。最后，国际化对巴拿马未来学术的重要性与其对巴拿马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一样，因此必须相应地推进。世界各地都有潜在的关于高等教育和科研的院校合作伙伴

——巴拿马所需的就是一些战略规划、额外投资和宣传活动。知识之城是推动这一议程难得的国家资产，应该得到更好地利用。

利用巴拿马的地理优势推动其落后的高等教育和科研基地对于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银行业、物流业和旅游业正朝着世界一流水平的方向发展，如果巴拿马想对全球经济有重大影响的话，该国的大学也必须如此。

肯尼亚大学：金融破产的边缘

Ishmael I. Munene

美国北亚利桑那大学 (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 教育领导系教授

电子邮箱: Ishmael.Munene@nau.edu

这是肯尼亚大学的关键时刻：过去三年来，该领域一直处于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之中，引发了人们对其可能长期发展的质疑。让人绝望的情况是，大学无法支付基本的运营费用，如支付工资、公用事业和法定缴款，包括所得税和养老基金。由于金融破产，一所私立大学被监管机构关闭，另外两所私立大学有两年时间清理所有债务或将面临类似的命运。公立大学系统债务为 1.1 亿美元，拔尖的公立大学的债务超过 1 000 万美元。

当前的危机呼应了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中期的金融灾难，当时由于国家预算削减以及学费和其他基于市场的战略的引入，公立大学系统几乎陷入困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年前因学费收入而资金充足的大学系统现在应该处于破产边缘。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宏观层面的政策改革带来的与整个系统相关的后果以及微观层面的制度治理弊端。前者包括系统增长、入学增长的不公平、质量提升策略、市场模式的失败以及国家支持减少，而后者则包括薄弱的金融治理制度体系。

政策挑战

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不协调的增长削弱了大多数大学的学费收入。最初的院校数量激增是为了应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自由化后对高等教育的前所未有的需求。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肯尼亚只有四所公立大学和一

所私立大学，而目前的大学数量为 63 所，其中 33 所为公立大学，30 所为私立大学。大约 70% 的公立大学是在 2012~2013 学年建立的。然而，大学数量的增长率远远超过了近年来高等教育的需求率。大学数量的这种不受限制的增长转化为每个院校可获得的学费收入更少了。

学生入学人数从 1990 年的 1 万人成倍增长到今天的 539 749 人。其中，86% 的人入读公立大学，尤其是前五名的公立大学。这种入学模式使得大多数私立大学只发挥了其 50% 至 60% 的学生容纳能力，这减少了学费收入——鉴于私立大学收取更高的学费，许多学生选择在公立大学学习。此外，由于地理位置和缺乏知名度，在边缘地区建立的新公立大学未能吸引足够的入学人数。因此，虽然系统的增长已经吸收了需求，但它也在这种依赖学费的教育环境中造成了不公平。

最近采取措施避免质量下降也导致自费学生数量的减少。两年前，当肯尼亚清除在国家高中考试中的作弊现象时，符合大学入学资格的候选人数下降了近 40%。从那时起，合格学生的数量仅足以入读国立大学（这是大多数高中毕业生的首选目的地，因为学费较低）。同样，由于这一原因，寻求入读私立大学的合格学生数量以及相关的学费收入大幅下降。

同样，质量改进措施促使大学教育委员

会 (the Commission for University Education) 限制低质量分校发展, 特别是公立大学的分校。这些的分校聘用了没有最高学位的兼职教师, 它们位于全国各个城市中心, 是大学以最低成本增加入学率和收入的重要渠道。制定严格的校园运营许可要求导致其中许多分校的关闭, 这剥夺了大学重要的收入来源。一所公立大学的 15 个所分校中有 10 所关闭了。

不幸的是, 市场模式作为一项为大学提供资金的战略的失败已为新自由主义政策作为国家融资的替代方案蒙上了一层阴影。除了以学费支持其大部分的日常运作外, 肯尼亚没有一所大学开发出强大的市场化创收系统。由于大学缺乏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 科研补助、咨询、工业合作伙伴关系以及商品销售等预期收入未能实现。虽然发达国家的大学从这些替代来源获得收入, 但肯尼亚与许多非洲国家一样, 缺乏支持此类发展的经济能力。

公立大学中国家资金的减少也导致了当前的危机。由于国家预算压力增大, 政府缩减了对公立大学的财政支持。例如, 在本财政年度, 公立大学系统预算减少了近 3 亿美元, 因为政府实施了紧缩政策以避免即将发生的经济危机。公立大学收到的资金为 10.3 亿美元, 而申请金额为 13.01 亿美元。此举将加剧裁员、招聘中断、科研和差旅支出的减少等。

院校财务治理的失败

根据已发表的报告, 肯尼亚大学无疑缺乏审慎的财务资源管理。各种调查报告的一个重要发现是直接盗窃和挪用资金。例如, 一所私立宗教大学五年前就有盈余, 但由于盗窃, 现已濒临破产, 债务约为 400 万美元。另外两所宗教大学由于财务资源管理不规范而经历过学生罢工和破坏性的领导层变革。公立大学也有其在财务上的不正当行为。它们被政府审计长引用为盗用资源和投资选择不当。例如, 这些大学根据自费学生入学人数的预计增长聘用了长期工作人员, 结果证明这是不现实的。一所公立大学在国外开设了两所分校, 花费近 700 万美元, 但由于监管违规, 这些校区在完全运营和收支平衡之前就被当局关闭了。

未来

缓解肯尼亚大学目前面临的财务压力需要立即注入资金, 但长期解决方案则需要多元化、创造性地重新思考为高等教育提供资金的财务战略。这包括为公立和私立大学提供经过深思熟虑和结构化的国家支持、院校层面财务决策的透明度, 将私有大学的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离, 将预算决策与现实的招生趋势联系起来, 以及聘请财务经理而不是学者来引导财务决策。

探索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公平：阿根廷和智利的反思

Ana García de Fanelli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国家与社会研究中心 (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State and Society) 国家科学与技术研究委员会 (the Nat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Research Council) 资深研究员

电子邮箱: anafan@cedes.org

关于高等教育公平的公开辩论通常关注招生和资助政策对整个系统的影响。首先,人们认为如果入选标准和程序越具有选择性的话,那么,低收入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越少。其次,人们认为通过学费分担本科学习的成本会减少弱势群体追求高等教育的机会。虽然这两个前提都是正确的,但另外两个因素可以显著影响高等教育的公平性:即中学和本科阶段教育保留低收入和文化弱势学生并提供高质量教育的能力;院校差异,这导致地位方面的垂直分层,低收入学生通常就读于低质量的院校。

阿根廷与智利的入学机会和资金

我们可以用来自拉丁美洲的两个案例来说明政策和公平结果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性,这两个案例表现出两极化的入学机会和资金政策。阿根廷对大多数本科课程都有非选择性录取政策(例如,没有入学考试或大量的招生名额),这些课程在公共部门免收学费,因此入学比例最高(占 2015 年总入学人数的 75%)。相比之下,智利系统是基于有选择性的录取政策、高度私有化的高等教育市场结构中的较高学费(2017 年,84%的入学者就读于私立院校)。原则上,我们应该期待阿根廷在教育上的公平性高于智利。

然而,这两个国家中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的入学率的演变并未反映这一假设。

智利迅速增加了属于最低社会阶层学生的高等教育机会,超过了阿根廷的净入学率。根据 2015 年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社会经济数据库(National Household Surveys compiled by the Socio-Economic Database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编制的全国住户调查数据,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群体的毛入学率在智利为 29%,在阿根廷为 19%。十年前,这一比例分别为 13%和 16%。此外,2015 年,最富裕的五分之一群体和最贫困的五分之一群体接受高等教育比率在智利为 2.2,在阿根廷为 2.8。

这些入学指标不一定意味着智利高等教育在各方面都比阿根廷更公平,但它们提醒人们注意在高等教育大众化和差异化背景下公平性所面临挑战的复杂性。此外,两个系统都显示出明显的不平等。为更好地理解影响平等的因素,我们需要研究上述两个问题:低收入学生完成中学学业和坚持本科学习的机会,以及他们可以入读的院校类型。

中学毕业情况和本科辍学率

中学阶段的毕业率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阿根廷在低收入学生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方面落后于智利。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智利 2015 年高中毕业率为 90%,阿根廷为 61%。在质量方面,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的结果显示,智利在一段时间内取得了比阿根廷

廷更好的分数和进步，尽管仍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因此，在中学毕业率低和学生成绩差的背景下，阿根廷的开放获取和免学费政策无法促进大学本科高等教育的包容性。

在这两个国家中，低收入学生糟糕的学业成绩阻碍了他们在本科课程中的进步，并导致其在第一年的学习期间辍学率更高。根据智利高等教育信息服务(the Chilean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的估计，2008~2012年中，本科生第一年辍学率约为30%。数据显示，来自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低收入家庭学生和从补贴性私立或市立/公立学校毕业的学生的辍学率较高。在阿根廷，没有可比较的数据，但基于《住户全国调查》(the Household National Survey)，我们根据年轻人(18~30岁)的社会经济状况计算了全球辍学率。数据显示，低收入学生的全球辍学率(55%)高于中等收入群体(40%)或高收入群体(21%)。

阶级分化

在过去十年中，无论是在阿根廷还是在智利，在本科招生扩张方面最具活力的院校都不是顶尖院校，而是非大学的公立或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和私立大学。

在阿根廷，虽然大部分本科入学者都就读于公立大学，但公立部门在总入学率中的比例在十年内下降了近10%(从2005年占本科入学总人数的63%到2015年占54%)。入学人数增幅最高的是公立的(小部分是私立的)非大学的高等教育部门，它们培训中小学教师，并提供短期职业和技术课程。此外，一些非选择性的，以教学为导向的私立大学

比精英型的、私立院校或公立大学更快地增加了其入学率。

在智利，2017年本科生总入学人数的61%主要集中在非选择性的专业学院和独立的私立大学。在专业学院、职业学位就读的人数在2008年至2017年期间的增长率最高。自2006年以来，特别是在2011年学生运动之后，学生资助政策通过扩大学生贷款和拨款计划增加了这些部门的入学机会(也包括技术教育领域)。2016年颁布的针对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学生的新《免学费法》(*gratuidad law*)也可能有助于增加就读最低选择性课程和院校的低收入学生的数量。这种经济援助措施不要求学生在全国大学入学考试(PSU)上达到最低分数线(但这仍是助学金和贷款计划的条件)。

总之，两国的大众化增加了新一代低收入中学毕业生入读公共和私营部门选择性较低和质量较低的课程的机会。由于缺乏沟通渠道和流动途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纵向分层有所加剧。

结语

鉴于高等教育中大众化和院校差异的复杂性，仅通过关注规范入学机会和国家或私人资助机制的一般政策来分析特定系统的公平性是不可能的。当关注中学和本科辍学率以及低收入学生就读的课程和院校时，可能会发现惊人的不平等。为了进行此类分析，有必要制定更多更好的指标，以解释学生群体的数量和质量变化以及日益大众化和多样化的中学和高等教育部门中发生的系统分层——这正是整个拉丁美洲正在发生的变化。

哈萨克斯坦学分制度的发展

Aray Ilyassova-Schoenfeld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 (Nazarbayev University) 公共政策研究院 (the Graduate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博士后学者

电子邮箱: ailyassova@nu.edu.kz

1991 年苏联解体后,对哈萨克斯坦而言,提升其高等教育的质量和竞争力至关重要。其目标是成为欧洲或美国系统的一部分或/和经合组织成员,以增强对其科研人员和教师及其工作的认可。哈萨克斯坦花了很长时间来达到目标。哈萨克斯坦所有的教育改革,包括教育结构或内容的变化,以及学分体系的发展,都是通过立法发布的。例如,《教育法》(the Law on Education)(2007 年)规定了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原则。它还解决了学分体系的过渡问题。

哈萨克斯坦大学的学分体系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从苏联教育系统的毕业生被要求通过计算或将他们的学习时间转换为国际评分系统,即美国系统以及后来的欧洲学分转移制度(the European Credit Transfer and Accumulation System)来证明其资格和学位的时候发展而来的。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苏联系统没有任何基于学分的学习。

历史的重要性

发展中国家向先进国家学习的愿望需要借用和引进新的思想和政策。这些过程发生在哈萨克斯坦,涉及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如瑞典和德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由于美国参与了哈萨克斯坦的不同项目,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机构开始实施美国的学分体系。在 21 世纪,教育部引入了与美国模式不

同的新哈萨克斯坦学分。主要区别在于学士、硕士和博士课程的每学分的小时数。目前的国家学分体系模式包括许多种评估量表。它的创建符合国际标准,又保留了哈萨克斯坦自己的政治、思想、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

吸取经验

在引入美国学分体系后,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机构着眼于欧洲,希望探索和识别其系统与欧洲大学之间的相似之处。通过建立一个工作组来响应教育部的指示,高等教育机构研究了在美国、欧洲和亚洲实施学分体系的 50 所大学的政策和实践。几个哈萨克斯坦高等教育机构将学分体系作为实验方案。当时,当地教育系统对一些术语(例如“注册员办公室”)和教学实践与角色,如顾问、导师和指导学生独立工作的教师等都不了解。探索并与国外大学互动让哈萨克斯坦借鉴了一些其他国外大学的实践。

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

融入欧洲教育空间成为哈萨克斯坦教育政策的重要方向。2010 年,该国成为博洛尼亚进程的成员。实际上,在正式遵守《博洛尼亚宣言》(the Bologna Declaration)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变化。例如,在 2003~2004 学年,哈萨克斯坦的高等教育机构引入了学分制和二级学位制作为一项实验。ECTS 和学位制度

的采用与博洛尼亚进程的影响没有直接关系。它也是通过在中亚实施一些欧盟计划,如跨欧洲大学科研流动计划 [the Trans-European Mobility Program for University Studies]、“伊拉斯谟世界计划”(Erasmus Mundus)和“伊拉斯谟+”(Erasmus+)来实现的。最后,1997年批准的“里斯本公约”(the Lisbon Convention)帮助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参与国家开展学术资格互认。

ECTS 是博洛尼亚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对评分系统进行标准化,以促进欧洲的学生流动。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对哈萨克斯坦的一个主要好处是引入了基于学分的学习,从而实现了流动性和在其他地方学习的灵活性。哈萨克斯坦试图在美国学分体系和 ECTS 之间建立关联,试图克服那些与建立国家学分体系模式相关的实际困难与哲学困难。

基于 ECTS 的国家学分转移模式

哈萨克斯坦目前的学分体系是美国和欧洲体系的结合体。它使用某些计算方法,包括本科水平的一个比例和硕士和博士水平的另一比例。在哈萨克斯坦,学分包括三个部分:课时、学士和硕士学位学生在教师(或助教)监督下的独立工作。出于实际原因,哈萨克斯坦采用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一个面授课时将被视为一个学时,以便激励

在欧洲留学的学生返回。尽管这种妥协代表了对已建立的欧洲系统的调整,但它确实帮助了哈萨克斯坦的管理、经济与战略研究大学(KIMEP University)等目前使用美国运作模式的机构更接近 ECTS 模式。另一个例子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Nazarbayev University),它强调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尽管纳扎尔巴耶夫大学也符合博洛尼亚的原则,但其学术框架是美国和英国框架的混合体。

结语

哈萨克斯坦的目标是使其高等教育体系与发达国家相提并论。自 1991 年以来,高等教育系统一直处于过渡期。哈萨克斯坦政府通过一系列改革,力求使高等教育系统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这些改革确立了学术流动,文凭补充和三级学位制度。学术界通过复制外国经验并使西方教育模式适应哈萨克斯坦的背景来努力实施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包括新的术语和头衔。哈萨克斯坦调整了学分体系以促进其海外毕业生的流动性和就业能力。学术界将苏联、欧洲和美国的高等教育系统结合起来,整合并吸收特定的实践,同时,在一个根据国家背景定制的国家学分模式中保留国家、文化、历史和语言特征。

